

# “新经济社会学”与中国的本土化模式

赵万林

(山东大学 社会工作系, 济南 250100)

**【摘要】** 格兰诺维特于 1985 年发表的《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被公认为新经济社会学诞生的标志，“镶嵌”（Embeddedness）“社会网”（Social network）等则构成其所主张的新经济主义的核心概念。新经济社会学打破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科藩篱，协调了“整洁模型”（clean models）与“肮脏的手”（dirty hands）的争论，促成了两个学科之间平等的对话。与此同时，伴随着新经济社会学思潮的涌起，中国学者们也开始了带有本土化特征的学科探索，并形成了与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并行的“交易秩序”取向的研究范式。本文旨在描述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评述格氏的“镶嵌”观念、并简要介绍汪和建教授等人对中国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和探索，以期厘清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中西差异，理智的认识格氏的“镶嵌理论”。

**【关键词】** 新经济社会学 格兰诺维特 镶嵌 本土化 交易秩序

自亚当·斯密和奥古斯特·孔德分别开创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以降，两大学科之间就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虽然在古典时代它们之间有过融合的传统，但当两者相继学科化之后，学科间的藩篱逐渐被人为筑就起来，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才促使这种隔阂逐渐消解（朱国宏，1999）。两大学科开始摒弃之于彼此的偏见，整洁模型”（clean models）与“肮脏的手”（dirty hands）之间的争论逐渐被双方所达成的共识而替代（陆德梅、朱国宏，2003）。并以此为契机，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展开了对话，且显示出学科互动朝向广泛而深入推进的可能性。

学科互动的可能性来自于格兰诺维特的《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格氏在文中指出行为、制度总是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反对那种持“通过原子化个人来实现经济决策和行动的观点”，认为“有目的的行动是具体的、历史性的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介乎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一种观点）。由此，他

适当分析了过度社会化（实质主义）与低度社会化（形式主义）两种不同的观念，声称无论是过度社会化还是低度社会化其实质都带有原子论的倾向，而不是从整体的视角去分析行为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他的研究中所要防止的错误（尹振宇，2013）。格兰诺维特研究的旨趣主要在于个体行为和总体形态之间的媒介，即社会网，而非帕森斯与他的徒子徒孙门所致力于的抽象空洞的理论，也非那些将社会简单地看作是个体心理活动之结果的化约主义<sup>1</sup>。

当西方学者狂热追捧格兰诺维特思想之际，中国却有一部分学者举起了建设具有本土色彩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大旗。他们认为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主要是在研究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的课题上分离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即所谓的“镶嵌性视角”，这是一种反传统的策略，而中国则是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国情对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对旧经济社会学的传统再造，是一种理论整合的策略。中国学者将“交易秩序”作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理念，而所谓的交易正是个体之间“交互影响的行为”，即互动，涵盖了一般性质社会关系概念。此外，他们还认为“交易”一词实现了个体选择与社会结构的统合（汪和建，2000）。在此基础上，以汪和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

##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

经济社会学是在社会学和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性学科，其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涂尔干、韦伯以及马克思等社会学家对经济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而学科化。20世纪50年代，在帕森斯、波兰尼等学者的努力下得到了新的发展（陆德梅、朱国宏，2003）。

涂尔干在亚当·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了分工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分工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促使人们更加团结，提供了“有机团结”的潜力。同时，指出了现代经济中的某些力量可能会冲击社会团结的内聚力，行为规则的缺乏会导致“社会反常状态”的缺乏。继涂尔干之后，其学生莫斯在涂尔干的指导下完成了著作《礼物》，《礼物》突破了以往单纯用经济理性分析“礼物交换”的研究范式，阐明了“礼物交换”既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跟法律、道德以及美学相关的社会现象。这种分析模式为之后新经济社会学的“镶嵌观”的出现

---

<sup>1</sup> 引用自格兰诺维特为《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所作的致中国读者序。

提供了最初的学说理念。韦伯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他积极接受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经济思想，将经济社会学当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一系列著作当中阐述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徐延辉，200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马克思承认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其思想仍然在经济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56年《经济与社会》<sup>2</sup>的问世标识着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成立，帕森斯在这部著作里运用自己的系统理论阐释了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及交互作用。波兰尼首次提出了“镶嵌”概念，后来格兰诺维特沿承并发展了波兰尼的“镶嵌”概念，并以《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建构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至此，经济社会学实现了学科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完成了从旧经济社会学向新经济社会学的转变。

## 二、格兰诺维特与“镶嵌问题”

格兰诺维特（1943—），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96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当代美国与欧洲史专业，曾师从于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哈里森·怀特，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sup>3</sup>。

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以及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等领域，并在相关领域发表了具有代表性和相当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弱连接理论”（Weak Ties），并指出弱连接的存在能够促使信息在不同“圈子”里流转，从而提高个人达成目标的可能性。在经济社会学方面，格兰诺维特注重将经济行动放置于社会网络中进行解释研究，提出在新经济社会学占有重要地位的“镶嵌理论”。作为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格氏凭借其“弱关系”概念、“镶嵌理论”以及对工具还原主义的批判从众多的经济社会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潜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廖亮、陈昊，2011）。

格氏代表性著作《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被看做是新经济社会学确立的标志，文中所涉及的“镶嵌”问题拓宽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渠道，也缓解

---

<sup>2</sup> 韦伯曾著述过《经济与社会》，但此处的《经济与社会》指的是帕森斯与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相比于前者，帕森斯更加注重“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系统视角。

<sup>3</sup> 参照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Granovetter](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Granovetter)

了多年来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争论，促成了学科间的互动与交流。格氏自己也将“镶嵌”概念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纲领（尹振宇，2013）。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中首先承认了行为和制度必须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网络，即其所谓的“镶嵌问题”，进而从“社会学和经济学内的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的角度阐释自己理论的中行路线取向——不盲从二者所持有的原子化个人倾向，个人的行为事实上是社会性、历史性地镶嵌在具体的社会网之中的。紧接着，格氏在“经济生活中镶嵌、信任与欺诈”一部分中论述了是他所提出的“镶嵌”而非制度安排和普遍道德影响经济秩序，并从这一维度阐述了所有的市场过程都适合于用社会学进行分析。最后，格兰诺维特为了具体应用“镶嵌观念”分析经济行动，对威廉姆森《在市场与科层》中的相关论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对“市场抑或科层”这个议题的研究应当细心地、有系统地关注经济交易中人际关系种类，对人际关系（社会网）的关注不仅可以发现垂直整合的动机所在，而且可以发现社会性孤立化市场与完全整合公司之间的过渡形式（格兰诺维特，1999）。可见，格氏虽然分别驳斥了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所代表的低度社会化与高度社会化两种极端，但他仍然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就像前面所述，格氏采取的中行策略，这让他的理论显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和解释力。

应该说，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在实现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更加深入的学科互动提供了契机，是两个学科走向合作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正如格兰诺维特自己所指出的那样：

最后，我要加述一点，镶嵌观点从事了直接的因果分析。我并不曾讨论广泛的历史与结构环境会导演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所以我不以为这个分析可以回答现代社会的本质或政治经济变迁等大型问题。

他的理论不能对问题进行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综合性解释。而在这方面，中国本土的经济社会学家所提出的“交易秩序”有效的规避了这一弊端。

### 三、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

建设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最早体现于汪和建教授在1999的著作《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sup>4</sup>。在这部著作当中，作者解决了建设中国新经济社会学的目的、方法、理论建构，以及对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视

---

<sup>4</sup> 后文简称《迈向》

角和方法进行批判性讨论等问题，从而使建设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成为中国学界的一项重要议题，开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本土化历程。

在《迈向》问世之后，引发了学者们对这项议题的兴趣，并提出了许多的对于“本土化”疑问，针对学者们的疑问，汪和建教授又于次年发表了《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一文。在文中直接指出：“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意在通过分离出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即所谓的嵌入（镶嵌）型视角，以研究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建设中的中国新经济社会学则力图从一种新的理论整合的角度——交易秩序的结构，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建立一个既能理论综合又能对经验问题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采取的是一种反传统策略，而中国的“交易秩序”反映的是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中西新经济社会学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的一个重要区别，而这一区别最终导致了两种流派所持理论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具有重要的差别。

从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区别中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只是汪氏论述中国新经济社会学的起点。他对“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个概念进行了解构，首先阐释中国研究（中国的）的特点应该是“学术的民族性”与“民族的学术性”的统一，“学术的民族性”指涉的是研究主体和经验事实的民族性，“民族的学术性”意指学术研究过程和结果的民族性，在这里，汪着重强调了研究主题的民族性涉及的不仅是国籍问题，而是属于民族归属的范畴，也即，所说的民族性研究主体指的是在民族文化氛围中实现社会化的研究者。其次，他认为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满足两个先决条件：沿革性与普遍性。换句话说，新经济社会学应该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同时吸纳或包容其取得的成就，即作者所宣称的“创造性转化”。

汪立足于中国正在发生双重秩序转型<sup>5</sup>的社会现实，抽象出了“交易秩序”的基础性概念。依作者的意思，交易是个体之间“交互影响的行为”，即互动，涵盖了一般性质社会关系概念，实现了个体选择与社会结构的统合，同时，这一概念既能包括经济因素也能涵盖非经济因素。“交易秩序”之所以能实现个体选择与社会结构的统合，也即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如何实现个体行为与总体形态之间的过渡，在于无论是交易者还是社会都面临着如何使个别交易的秩序有助于产生社会交易的秩序，因而，汪氏的“交易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格氏“社会网”

---

<sup>5</sup> 按照作者在《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一文中所述，双重秩序转型指的是计划的交易秩序和传统的交易秩序朝向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转变。

所具备的效能。在中国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上，汪主张对建立和发展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和互动关系的分析，建立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经济社会理论——交易秩序理论。

#### 四、简短的总结

根据格兰诺维特在《镶嵌》、汪和建在《中国研究》以及其他二手文献中所提到的观点，笔者认为中西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差异表现在对待传统理论的态度、研究对象<sup>6</sup>、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等几个方面。（见下表：表一）

表一、中西新经济社会学的差异		
	中国新经济社会学	西方新经济社会学
对待传统的态度	理论整合（创造性转化）	理论创新（反叛）
研究对象	经济与社会关系	经济现象
研究方法	综合分析	直接的因果分析
基本概念	交易秩序	镶嵌
备注：表格根据《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探微》《格兰诺维特镶嵌性思想述评》等综合而成。		

纵观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促使经济社会学由“旧”向“新”转变，完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第三次发展，他在经济社会学界的地位无可撼动，其理论也对今后西方乃至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诚如郑杭生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社会学要得到发展，必须要树立“理论自觉”的意识，而要真正做到“理论自觉”需要对社会学进行“再认识”“再评判”“再提炼”（郑杭生，2013）。之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新动向，中国的研究者需要审慎的吸纳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中适合我国实际的部分，同时立足于本国经验以及汪和建教授所说的本土意识积极建设符合我国实际经验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而不是简单的套用西方理论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克服不具有理性的“拿来主义情结”，主动的让渡“中国学派”在新经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

<sup>6</sup> 研究对象的不同指的是：中国新经济社会学以经济和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而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则是将这门学科当做一个研究经济行为的社会学视角。

语权。汪和建教授的交易秩序理论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坚持“理论自觉”的有益尝试和探索，他的这种坚持正是我们对待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思想应该持有的态度——承认格氏在推动社会学和经济学积极对话方面的贡献，承认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结合中国“双重秩序转型”的实际，建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与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展开积极的对话，求同存异。

#### 参考文献：

- 1) 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第五期，39—43页；
- 2) 陆德梅、朱国宏：《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探微》《国外社会科学》，2003，第三期，22—28页；
- 3) 尹振宇：《格兰诺维特嵌入性思想述评》《重庆与世界·学术版》，2013，第九期，28—30页；
- 4) 汪和建：《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第二期，141—152页；
- 5) 徐延辉：《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第三期，9—12页；
- 6) 廖亮、陈昊：《马克·格兰诺维特对新经济社会学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11，第九期，99—103页；
- 7) 郑杭生：《破除边陲思维》《北京日报》2013年09月；
- 8) 格兰诺维特著，罗家德译：《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1—37页；